

□刘佳怡
宋婧琳

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和劳动关系正经历深刻变革。资本在数字时代的表现并非简单的“资本+技术”叠加,而是技术介入下资本增殖的再生产形式,核心在于数据、平台和算法的交织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增殖理论揭示了数字资本通过技术控制劳动过程、重构价值分配,形成新的剥削机制。尤其是在“平台化”与“数据化”背景下,劳动者的价值衡量标准从传统的时间和技能转向平台算法设定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劳动异化加剧。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数字资本规制的理论路径强调制度性保障和技术伦理重构,旨在确保技术进步服务公共利益,重建劳动关系正义。回应这一新型剥削机制,需通过社会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发展与劳动保障的协调,实现数字资本的正向效应与劳动解放的统一。

数字资本的本质逻辑

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社会肌理的时代浪潮中,资本增殖逻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变。当“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资料,“算法”成为组织劳动、控制行为的关键机制,“平台”正更是成为支配资源配置、市场准入与社会关系的基础设施。技术的飞跃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打破了空间限制,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与创新生态。然而,在繁荣的表象背后,是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重塑着劳动关系,将整个生活世界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逻辑之中。由此,技术进步是否意味着劳动解放,抑或是剥削机制的隐蔽升级,成为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

数字资本的本质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条件下的当代表达,其深层结构依然围绕着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始终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总和,其运动逻辑总是围绕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资本积累的目标展开。无论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抑或是数字资本,其本质上均嵌套于资本从G出发经由商品与劳动到G'的自我增殖循环之中。因此,数字资本的出现绝非“资本+数字技术”的机械叠加,而是资本逻辑通过数字形式的自我延展与再生产。具体地说,在数字化时代,数字资本在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以“平台”作为集中控制生产、分配与流通的基础设施,以“算法”作为劳动过程自制与控制的手段,实现对劳动关系的在组织与对价值再分配的过程。由此形成一种具有排他性、垄断性的新资本形式。

不过,但相较于传统工业资本对劳动身体的显性控制,数字资本的权力运行呈现出更精妙的双重面相:在技术中立的表象下,平台通过游戏化机制激发劳动者的自我驱动力,将绩效指标转化为内化的价值准则;在数据流动的掩护中,劳动成果被转化为平台独占的数字资产,形成价值榨取的新通道。这种机制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既保持着G-W-G'的经典增殖公式,又通过技术中介模糊了劳动价值创造的时空边界,使得劳动者的休闲时间、社交关系乃至情感体验都被纳入剩余价值的生产体系。而更隐蔽的则内化于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之中,平台通过积分体系、等级激励与内容分发机制激发劳动者的主动性,使其在“游戏化”的劳动中自觉延长工时、增加强度,最终在看似自由选择的逻辑中完成自剥削。

在这种结构下,劳动者的意识结构与价值判断方式也发生变化。劳动不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创造过程,而逐渐演化为一种数据生成、欲望激发与情感投人的复合性行劳动者被异化为流量资源,其价值的衡量标准不再是投入的劳动时间或技能水平,而是平台算法所设定的关注度、参与度和响应率。算法通过不断优化匹配逻辑,引导劳动者围绕平台规则进行行为调整,从而形成一种制度性规训机制。劳动者逐渐将平台设定的效率指标和绩效标准内化为自我评价的依据,最终形成了数字化规训结构中“主动服从”的主体。基于上述逻辑,技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失去了其工具理性中立的性质,转而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与权力的延伸。因为从资本使用技术的目的来看,其并不关心技术本身的中性属性,而是通过技术实现对劳动控制的再升级,并最大程度攫取利润。这种以资本利益为导向的技术演化路径,正在系统性地削弱人的主体性,压缩技术发展的公共价值空间。

由此出发,数字资本的快速发展不仅引发了劳动关系的结构性转型,也带来了权力结构的深度变化。这说明,如果“技术进步”脱离了对技术运用目的和社会结构的反思,极易蜕变为剥削升级的工具。因此,回应数字资本的这一新型剥削机制,不能止步于伦理批判或个体调适,而需要回到制度设计层面,重构以人民为中心的技术价值观与劳动保障体系。唯有如此,方能打破技术操控与资本统治交织形成的数字化剥削闭环,在数字社会中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为建设更真正义性的劳动关系奠定基础。因此,在面对数字资本逻辑系统性蔓延的现实背景下,回应其技术统治和劳动异化的趋势,已不仅是伦理层面的反思,更是制度构建的紧迫命题。

数字资本的规制理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为数字资本规制提供了具有本土合理性的路径资源。在这一框架下,技术并非天然进步的代名词,而是一种需由社会共同体赋予方向与目的的工具体系。正如马克思“黑人之所以是黑人”的论断,恰是证明技术的属性并非抽象中立,而始终嵌套于特定社会关系之中。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规制数字资本,绝非对技术的否定,而是对技术发展方向的再设定。这要求超越“技术乐观主义”与“资本批判”的二元对立,在技术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中探寻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因此,中国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技术演进的根本目标,始终强调通过制度性安排纠正资本主导下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这种规制逻辑并非回到计划经济的直接干预,而是在技术加速与资本扩张之间建立“生态阈值”,确保技术为公共利益服务,资本运行不突破社会底线,从而实现数字资本双重效应的正向收敛,推动劳动关系的再平衡与社会结构的再公平。

其次,数字技术的错位生长风险源于资本逻辑对创新方向的扭曲。在数据依赖与数字拜物教的双重作用下,数字技术不再是提升生产力的工具,而成为“数字癌症”的工具。这种错位发展并非技术本身的缺陷,而是被资本的逻辑所塑造。对此,中国在数字治理中设定技术演进的坐标系——将“人的全面发展”设定对技术进化的元规则,从制度层面推动数字技术向社会价值回归。一方面,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推动技术伦理规则体系建设,如算法备案、数据权属确认、人工智能伦理审查等制度创新,限制资本对技术控制的任意性;另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公有化、公有资本引导等路径,确保关键平台资源向社会共享转化,防止“数字寡头”形成结构性垄断。此外,在劳动保护层面,重构平台责任边界、确立算法透明机制、完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已成为建设数字社会劳动正义的政策关键。

最后,数字资本的规制不仅是技术治理的问题,更是制度选择与价值导向的问题。在数字化社会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重建劳动关系的正义性基础,必须从资本逻辑的根本性批判出发,打破技术与资本勾连形成的控制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制度性保障、社会价值重塑与技术伦理重构缺一不可。唯有在制度框架内重塑技术发展的公共性,才能打破数字剥削的再生产机制,构建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平为导向的数字劳动新秩序。这是对数字资本最根本的回应,也是实现劳动解放与技术进步真正统一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作者单位:刘佳怡,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宋婧琳,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0)

打造结构优、活力强、潜力足的教师队伍

——以石家庄学院为例

□张余

效促进青年教师专业化发展。

制度护航,夯实职业发展根基。出台《石家庄学院新入职教师上岗管理办法》《石家庄学院教师教学培训管理办法》《石家庄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让青年教师更快熟悉岗位职责,更好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科研赋能:点燃创新突破“强引擎”

石家庄学院创新构建“项目-团队-制度-平台”四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深入实施“双进工程”(即进团队、进平台),通过政策保障与激励机制的优化完善,打造全周期支持的科研育才生态。

项目驱动,厚植创新沃土。依托校级青年人才项目、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等项目,推动青年学者申报国家级青年项目、省部级青年项目,并优先提供科研配套经费。2019年以来科研项目量质双增。自然科学领域,青年教师到校3年内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项,56名教师获批河北省科技厅、河北省教育厅等省级单位科研项目63项,占同类项目的51.6%;社科领域,67名青年教师获批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等省级单位科研项目89项。广大青年教师、新入职博士已成为省部级以上高水平科研项目申报的中坚力量。

团队协同,成果转化成绩卓著。依托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要求每位青年学者加入1个校级团队,通过“老带新”模式推动学术传承与创新。推动青年学者加入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优先支持其担任项目核心成员。5位青年教师获河北省科技进步、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省部级奖励6项,占石家庄学院近几年科研获奖的54.5%;54位青年教师出版专著87部,占石家庄学院著作的52.4%。同时广大青年教师助力石家庄学院高水平论文、授权发明专利、到账科研经费持续增长。

制度激励,导向产出大成果。通过职称评

审直推,强化标志性成果导向,形成高潜力青年人才“快速冒尖”,初步显效。

生态优化,拓宽学术视野。要求各院部每月举办学术活动,邀请校外专家举办讲座,并设立学术交流经费补贴制度,要求青年学者参与高端学术交流,效果良好。

管理砺剑:培育治校理教“多面手”

学校将青年干部培养纳入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工程,通过“实践淬炼+结对帮带+专项攻坚”模式,打造了一支善谋划、敢担当、能攻坚的青年管理队伍。

一线淬炼,厚植为民情怀。选派两名青年干部参加平山县安里村驻村工作;选派两名青年干部参加下沉工作队,为民服务。

师徒传承,加速能力跃升。各学院落实青年教师导师制度,形成“多帮一、师带徒”帮带机制,尤其是教师教育学院依托“党建领航铸魂工程”开展青年教师培塑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战略赋能,服务发展大局。积极选派青年干部参加省、市委党校等高水平平台的学习培训,提升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目的地让青年干部参与学校重大专项活动,注重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培养干部,提升青年干部的大局意识、综合素质。

石家庄学院始终坚守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办学定位,以一流党建引领和保障学校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进程,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活力,服务大局,稳中求进,以“精准施策、多维赋能、长效培育”为核心,构建起教学能力精进、科研创新突破、管理素养提升的三维育人体系,教师队伍实现量质齐升,一支结构优、活力强、潜力足的教育“梦之队”正在加速崛起。

(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

传承“铁人家规”

将纪律要求转化为文化自觉

□张伟

在共和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王进喜不仅以铁人精神铸就了不朽丰碑,更以“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沾”的家规,为党员干部树立了廉洁自律的永恒标杆。这份家规,看似朴素简单,却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和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廉洁自律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王进喜将党的纪律要求内化为家庭准则,以言传身教让廉洁基因融入血脉,使纪律约束升华为家风传承,实现了制度约束向文化传承的深刻转化。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铁人为镜,将纪律要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行动自觉,让清廉之风吹拂每个家庭,浸润每寸心田。

以俭养廉:补丁里的精神密码

节俭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有着深刻的内涵。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强调了节俭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意义。

王进喜在穿衣方面极为朴素节俭,在玉门油田、大庆油田工作期间,几乎每天都穿着石油工人的工作服。他曾说:“我是工人,穿工作服最踏实。”这种对工作服的执着,不仅是对自身工人身份的认同,更是对劳动价值的尊重。工作服上的每一个补丁,都记录着他与石油工人并肩作战的岁月,承载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在1969年党的九大这样的庄严场合,他依然身着补丁工服参加,用最朴素的着装诠释最纯粹的信仰。

在大庆油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铁人上井三件宝:笔记本加炒面袋,还有一件羊皮袄。”这件从玉门到大庆一直伴随王进喜的老羊皮袄,不仅是他抵御严寒的工具,更是他艰苦奋斗、朴素生活、廉洁作风的真实见证。当组织要为他做新衣时,他摩挲着袄面的补丁,眼神坚定:“衣服破点没关系,只要心里干净就行。”这句质朴的话语,如同黄钟大吕,道出了廉洁自律的真谛。在王进喜的观念里,物质的简朴与精神的富足并非对立,相反,节俭的生活方式能够让人摆脱物质的束缚,更加专注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从而实现真正的廉洁。这种廉洁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俭以养德的思想不谋而合,同时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理论,展现了王进喜对廉洁内涵的深刻理解与践行。

以廉正身:舌尖上的纪律底线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王进喜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面对粮食定量低、职工们吃不饱的困境,坚守“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政治自觉。

王进喜叫老伴王兰英把炒好的玉米面装在

袋子里带在身边,到吃饭时就抓把炒面用开水冲好了来充饥。那个每次只能装三斤的炒面袋,却要支撑他“全天滚”的超强度工作。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他与职工同甘共苦的精神。当炊事员出于关怀在炒面中添加半勺猪油,他以“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建设,我们怎能搞特殊”的严厉批评,彰显出共产党员对群众利益的高度重视。在王进喜看来,在困难时期,党员干部更应该与群众站在一起,共同克服困难,而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这种行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宗旨的理论,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面对来历不明的肉食,王进喜不仅坚决退礼,更以整肃会议敲响廉政警钟,将个人操守升华为制度建设的自觉行动。他的这一做法,体现了从个体廉洁到制度约束的升华。王进喜通过整肃会议,将廉洁自律的要求转化为团队和组织的共同准则,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大庆油田的良好风气,也为其他单位和组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给家人立下的“无论何人以何种理由赠送物品,都必须坚决拒绝”铁规,是对廉洁自律底线的寸土不让,是“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初心使命。这一铁规使廉洁意识在家庭内部得以强化和传承,进一步巩固了廉洁自律的防线。

以规治家:车轮上的廉洁刻度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权力,做到权为民所用。王进喜常说:“公是公,私是私,就像原油和水,永远不能混在一起。”这句话深刻体现了他对权力本质的正确认识和对公私界限的清晰把握。

那辆自掏腰包购买的“小黑兔”摩托车,记录着王进喜对公权力的敬畏,见证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公私界限的坚守。这辆花费他三个月工资的摩托车,累计行驶里程超过5万公里,却从未报销过一分油费。从经济层面看,王进喜自购摩托车并承担费用,避免了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共资源;从政治层面而言,这是他对权力边界的自觉维护。在他的观念里,个人的需求和公共的资源必须严格区分,不能因为拥有一定的权力就随意动用公共资源来满足个人利益。

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中关于权力正确行使的要求高度一致。当组织配发吉普车后,他主动将其转化为服务生产的“流动指挥部”,却对家人竖起禁用红线。母亲生病时,孙子用自行车送奶奶去医院,而吉普车就停在旁边。王进喜将组织配发的车辆视为服务生产、服务群众的工具,而不是个人或家庭的特权象征。这种不是亲情的冷漠,而是一名党员干部权为民所用的庄严承诺。他通过实际行动,向家人和身边的人传递

了正确的权力观,使廉洁用权的理念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得以传播。这些生动的价值自觉表明,真正的廉洁不仅体现在重大考验中,更蕴含在日常生活的每个选择里,体现在对权力的每一次使用和对公私界限的每一次把握中。

以文化人:家风里的精神传承

家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强调,文化具有传承性和教育性,优秀的文化能够塑造人、影响人。王进喜当上大队长后,领导的部门多了,手中有了一定的权力,找他办事的人也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进喜同母亲商量后对全家定下一条家规:“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沾,有谁送东西,一样也不准收。”

王进喜的母亲身体力行,直至离世前仍带领这家人严守这条家规。妻子王兰英在养猪场干了20年临时工,始终没转正;弟弟王进邦在油田干了一辈子钻工,从未借兄长之名谋利;儿子王月平从普通工人做起,靠实干走上领导岗位。1970年寒冬,卧病在床的老母亲面对服务大队送来的慰问糕点,用颤抖的双手推开:“我大儿子说了,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沾。”这些家庭成员的经历,是对家规的忠实践行,也是廉洁文化在家庭中传承的具体体现。在这个家庭中,廉洁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每一个成员的实际行动得以延续和发扬。

“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沾”凝聚着一个家庭跨越三代的价值共识,是一个普通家庭对廉洁家风的世代坚守。王进喜家庭“三代守一规”的佳话,是廉洁文化在时代长河中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王进喜的家规通过家庭内部的言传身教,将廉洁意识深深植入每个家庭成员的心中,形成了独特的家庭文化氛围。这种家庭文化又通过家庭成员的社会活动,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推动整个社会廉洁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它证明了廉洁文化不仅可以在制度层面得以保障,更可以在文化传承中得到升华,成为一种持久而强大的精神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四个考验”与“四种危险”交织叠加,“铁人家规”的精神遗产,恰似一剂涤荡心灵的良药,为党员干部抵御腐蚀、锤炼党性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传承“铁人家规”,就是要以铁人王进喜为镜,将纪律要求转化为文化自觉,让清廉家风浸润每个家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融入日常、融入经济,让党的优良作风发出新的生机,以自我革命精神续写新时代廉洁奉公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邮箱:abcd518@126.com